

人物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2008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发展中国家担任此要职的第一人，这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刮起一股“林旋风”。

2012年6月世行任期届满，回到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林毅夫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传奇。他生于台湾宜兰，上世纪70年代末来到北京，更精彩的人生画卷由此展开。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硕士毕业后，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学习研究发展经济学，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1987年，他带着30多箱英文资料回到国内，将所学充分运用到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

他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采纳，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曾评价说，林毅夫是一个拥有梦想，并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



林毅夫在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演讲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曾被称为“林旋风”的林毅夫再发慷慨之辞——

中国梦，我们这一代人可实现

3月31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走上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的演讲台。台下，走廊加座亦爆满，许多人一直站着聆听了2个多小时。

2008年6月，林毅夫履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成立以来首

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八任均由全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担纲。“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良好的发展，”林毅夫微笑着说，“水涨船高，我个人才有机会到这样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来担任要职。”

个人观点

“国进民退”不会长期存在

林毅夫认为，暂时的反周期政策造成的“国进民退”现象，等经济恢复到正常，就可解除或缓解。“比如说‘国进民退’，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想逆原来市场改革的方向而行。2008年后出现全球金融危机，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政府必须推行反周期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要上大项目，就需要有能力的大企业承接项目，但大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因此这一时期国企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提高。这些大项目建成以后，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建设，可以显著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房价为何“十年九调”仍无效

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出台，当中三分之二属于银行贷款。这其中存在管理不善的地方。在中国，用银行的贷款会创造银行的存款，银行的存款又会变成银行的贷款。他举例，一个项目需要1亿元，每年2500万元，第一年只需付2500万银行贷款利息，其他7500万是承诺金。但是现在1亿元一下子拨付给企业，企业有了贷款变成银行存款，银行又把这笔存款贷了出去，滚来滚去造成现在银行业的利润是所有行业最高的。“如果我是企业，贷1亿元就必须付全部利息，首年使用2500万元，折合下来利息将近24%。怎么办？只有先短炒一部分，房地产是最好的方式。大企业拿到钱就是刚才讲的方式，不搞房地产才怪。”

双轨制保留了很多扭曲

就收入分配跟腐败的问题，林毅夫一针见血地批评说，这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改革不到位。我国走的是双轨制渐进式改革道路，保证了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但双轨制保留了很多扭曲，比如存款利息被压得过低。大企业能以很低的价格拿到钱，而中低收入的储蓄者等于在补贴大企业。还有一些服务行业存在垄断。既然保留扭曲，就会造成很多寻租行为。

治污染有规定但执行不力

目前我国制造业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碳排放和粉尘较多。现在控制污染排放技术比三五十年前进步多了。烟囱应该装过滤装置，规定是有，但是执行不力。“如果真能控制，虽然污染在现阶段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应该会好很多。这就牵涉到在执行上是不是真的落实到位了。”谈瓔

观念交锋 判断危机

初到世行，林毅夫为自己的定位是：作为在中国研究农村经济及改革发展的大学教授，把中国促进经济腾飞、减少贫困人口的经验带去，指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

2008年8月底，美联储在小镇召开世界最高层次的货币金融主要学者和决策者的会议，林毅夫应邀出席。世行前行长在小镇附近有个庄园，邀请了近十位客人，其中有美国财政部长、欧洲的银行行长等。晚餐时讨论起次贷危机，多数人认为，30年后会被忘记。林毅夫当场提出质疑。邻座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回应说：“因为我们对各种危机爆发的原因非常熟，不会犯同样错误。”林毅夫反驳道，每次危机的原因都不一样，有可能爆发一场没有办法预防的危机。

3周后，雷曼兄弟倒台。全球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超过50%，发达国家股市跌幅超过40%，生产及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各国失业率迅速上升。

林毅夫判断危机可能长期持续。泡沫破灭后需求减少，出现产能过剩。他认为除了社会救济之外，政府应该用增加的财政赤字短期投资基础项目，打通瓶颈，增加就业，创造需求。当时内部反对意见强大，而世行行长佐利克是他的支持者。

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势头后，2010年10月，林毅夫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过一场辩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退出积极财政政策。林毅夫反对，认为这会增加失业，应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质量。一年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彻底认同了他的观点。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林毅夫总结说，“最困难的还是厘清这场危机产生原因的辩论。”

当时国际矛头指向中国，危机爆发源于巨额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中国的汇率低估造成国际的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出口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还鼓励房地产投资，泡沫破灭后，导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林毅夫认为，这个理论说不通。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人民币被认为严重高估，直到2002年还在炒人民币严重高估，隔年评论突然转成低估。如果说法成立，那么2003年、2004年中国贸易盈余应远大于1998年，可事

实正好相反。

林毅夫认为，国际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美国：首先，美国20世纪80年代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增加了流动性；其次，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为避免经济萧条，美联储将利率从6.5%一直调到2003年的1%，等于货币供给大量增加，造成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金融创新又鼓励房主再抵押套现，增加消费；三是美国打伊拉克战争，财政赤字增加。

贸易逆差这么大，在其他国家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但美国是储备货币国，可以印钞票。这不仅鼓励了国内的金融投机，热钱还流到国外投机套利。大量资金流到发展中国家，成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锁在保险库里没有任何回报，又回流到美国买国债。

“我在世界银行想把这个故事讲全基本不可能。因为在华盛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能批评美国的政策。尤其我是从中国来的，一提这场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是由中国政策引起，而是美国政策引起的，大家马上说‘你是替中国政府辩护’，不跟你进行平等的学术性讨论。这是我在世界银行面临的最大困难。”

开出药方 投资基建

发达国家占到全世界将近60%的生产总值，实际上生产力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如果它们不走出危机，全球仍会面临下滑的压力。林毅夫表示，即使南欧国家得到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入，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任何援助像止痛药一样，只是暂时缓解，3至6个月以后问题卷土重来。美国同样需要结构性改革。

赤字急剧积累，为了减少政府还本付息的成本，发达国家会采取很宽松的货币政策。极低的利息鼓励金融投机，炒高股价、房价，形成泡沫化。如果允许资金大量流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就会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实体经济受到影响。

有没有办法解决？林毅夫坚持推广中国经验：把政府积极财政政策运用成有效投资。他提到，1998年朱镕基总理也推行了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投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财政赤字短期增加，但增长瓶颈解除，增长加速，所以到2008年中国推行新一

轮的积极财政政策时候，政府的负债已从30%多降到22%。

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老旧。比如美国的铁路，从华盛顿到纽约搭火车，最快也要2小时45分钟，距离只有350公里。如果建高铁，效率可提高很多。再比如，美国供电以火力发电为主，火电厂普遍“40岁”以上，污染且低效。高速公路很多是二战以后建的。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基础设施。欧洲也是如此。他在2009年提出一个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建议在全球的范围内找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投资。

中国有梦 早日富强

“作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总有一个梦，那就是中国梦。”这是林毅夫的肺腑之言。他相信，中国能够成为第三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到2020年左右进入高收入社会，人均收入达到12000美元。

他到世界银行以后走了很多国家，发现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点，老百姓希望靠自己的奋斗改善生活，国家的富强，是共同愿望。有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慢，并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在思想观念上一一直以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模仿建设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大产业，但推行的结果非常差。

而少数成功的经济体，在政策推行时通常被认为是错误的。比如能够成功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国家，是以出口为导向，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型加工业起步的，中国就是其中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例子。他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吸收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可以更快地发展，但前提是它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须找准产业、技术，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然后从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

展望未来，他相信中国能维持比较快速增长。未来人民币会成为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他最后有感而发：“发展中国家总认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在，拿回来使用就可以帮助实现现代化。实际未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水平赶上去，还包括文化和思想的复兴。过去30年国际上大部分时间在唱衰中国，但我们坚持发展。中国人有梦，国家的富强，生活的幸福，这个梦应该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

本报记者 谈瓔